

新发展阶段,企业竞争力从何而来?

本报记者 崔吕萍

6月2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强调深化“放管服”等重点改革,助力市场主体进一步恢复元气、增强经济发展动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为今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委员和业界专家认为,提升市场竞争力,除了政策保驾护航外,企业自身也要爬坡过坎。

▶▶▶瞄准的发展目标中,应有安全这一项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高培勇看来,“新”是相对于“旧”而言的,新发展阶段相对于既往的发展阶段,存在着一系列系统性差异。

“当前,我国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而在新发展阶段,无论是机遇还是风险与挑战,都有新的变化。”在高培勇看来,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以往我们的发展是顺势而上,而在新发展阶段,我们的发展是顶风而上的;以往提到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都说机遇比较容易把握,风险、挑战也较容易识别,但今天无论是机遇还是风险挑战,把握和识别的难度都显著增加;以往我们的发展水平低,制约发展的主

要因素是物质条件,而今天,人们的生活重心越来越从物质转向到了精神层面;以往我们谈国际合作,我们同别人的互补性强,而在今天,再论及国际合作,我们同别人的互补性,已经越来越转化为与别人之间的竞争性。

“这就使得,在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所瞄准的目标已经在既往的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之上,添加了更为安全这一点。这也要求企业在做战略分析时,在增速、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就业、物价等诸多考量中,也要加上安全这一维度。”这是高培勇的建议。

▶▶▶数字时代企业发展的观察角度

当前,以新能源汽车、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技术,逐步进入大规模产业化运用加速阶段。

“伴随着这种发展趋势,产业的专业化分工将进一步细化,劳动生产率也将进一步提升。在此背景下,我国要紧抓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机遇,充分激发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以创新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新的跃升。”谈及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

所长李雪松这样说。

用李雪松的话说,我们既要欣喜地看到,一些代表性企业正在快速成长为科技型领军企业,也要看到在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传统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同样值得期待。“我们相信,万千企业对新科技的探索 and 运用必将促进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纵横裂变,随着居民消费升级步伐的加快,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必将促进数字化转型,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新的勃勃生机。”李雪松这样说。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互联网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陈煜波看来,数字时代也给人们带来了3个挑战。

第一,由于数字人才越来越流向软件互联网行业、客观上向头部城市“回流”,因此必须要加强数据资源的整合、开放、共享、流动和监管,推进数据要素市场改革和全球数字治理,这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和保障,也唯此,才能推动数字人才向传统区域与行业流动。

第二,既懂行业,又具有数字化素养的数字人才一定是下一个阶段中国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

第三,要强调加强数字技术和生物、材料、能源等技术的价差融合,加强颠覆性数字技能的培养。“一个最典型的就是我们现在提得比较多的‘双碳’目标,如果没有数字化,我们或许无法实现这样的目标。”李雪松这样说。

三孩经济的3个关注点

本报记者 崔吕萍

继二孩政策后,中国决定放开三孩生育!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十四五”时期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大政策举措汇报,审议《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

三孩要来了,三孩经济也要开始构思布局了。

“三孩经济前景可期,机不可失。”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在接受我们采访伊始就给出了结论。

人口是经济的基础,不仅关系到需求和供给的扩大,也关系到创新创业的活力。对此肖钢表示,要落实中央和中科社创新和科技改造转型之中,预计今年将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以后还会逐渐增加。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表示,全国要在2030年前达峰,意味着至少大部分东部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都要在“十四五”期间达峰。

“实际上从能源消费增长来说,中国大部分省份已经出现了拐点。”李俊峰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接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甚至和21世纪初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过去是全面增长,现在则是由一两个项目拉动增长。所以,各地对于如何把握发展节奏,能源消费增长与否,应该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

谈及“双碳目标”与能源转型的关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指出,碳达峰是能源革命的里程碑,也是碳中和的基础。不能把碳达峰理解成“现在尽量用得高一点”,而是要把碳强度降低65%以上,大约相当于105亿到110亿吨二氧化碳。在他看来,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峰来“攀高峰”,关键是要防止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冲动。碳达峰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指向高质量发展,是产业调整的机遇。中国应借此机会逐步调整高耗能产业占比的现状,同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

“若想为之后的碳中和争取更多时间,应尽可能将碳达峰的日期提前。”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骞建议,按照空间、区位、能源和资源禀赋及产业布局比较优势,全国统筹优化不同地区在能源、资源能源和产业方面的功能,确定能源供给地区与品种格局,确定能源跨区输送通道的分布。

一是推进国企改革管理创新。建议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专司国有资产监管,不予干预企业依法行使自主经营权、领导班子外的人事权及分配制度。在战略规划、薪酬管理、选人用人、股权改革等方面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度,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

二是完善种业法规政策。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建立“实质性派生

产品制度”,保护原始创新,提高侵权成本,更好地激发种企特别是龙头企业的研发积极性。实行品种审定改革,建议除国家审定外,以生态区审定替代省级审定制度,进一步完善审定标准,逐步试点建立企业对品种的负责制度,实现品种审定到品种登记制度的过渡。明确转基因和基因编辑政策。提高种企门槛和市场准入,提高国内种企的整体竞争力。

第二,合理分配资源,真正使种企成为创新的主体。

一是促进人才、技术、资源向企业流动。建议通过出台育种公益性研究3年和5年重点目录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科研院所的公益性研究范围,推动更多优秀的育种人才转入企业。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引导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通过技术入股、成果参股等方式参与企业商业化育种,解决因惑科研人员的“身份问题”。将资源、技术及品种合理转移到企业推广应用等情况纳入科研单位绩效考核体系,促进科研单位科技成果应用与转化。

二是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优化整合财政、科技和产业发展相关计划,扩大现代种业基金规模;对种业企业实施更大力度的定向税费减免、

▶▶▶企业信息化与价值流要实现“形影不离”

面对数字化时代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越来越多企业正积极拥抱新型数字技术加快数字化转型。对此,海南火链科技CEO袁煜明表示,现阶段所有企业已经进入了深度的转型期,传统模式的商业治理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变化的市场需求。在此背景下,数字科技发展将迎来价值红利。

根据互联网数据中心(IDC)发布的《全球数字化转型2021年预测》,2021年,基于区块链的产业内部价值链将在各个行业内进一步渗透,帮助各行业节约35%左右的交易成本。同时,全球30%的制造和零售企业将有望通过区块链构建数字时代的新型信任模式,帮助各行业提高协作效率,实现产品质量等关键信息溯源。

“区块链应用的不断开展,让区块链技术不再局限在某个场景的存在。但一个事实是,虽然当前很多企业的电子化程度已相对较高,但信息化和价值流仍处于分离状态,价值流中资产的托管、保存、交割等是一套独立的体系。而要保证信息化和价值流的一致性,就需要不断地去校验核对,耗费较高成本且效率低下,出错率高。”在袁煜明看来,数字化可以帮助企业通过实现信息流与价值流的统一,降本增效乃至创新生态。

全国人大代表刘汉元:

“十四五”期间光伏发电成本将低于煤电

本报记者 李元丽

6月2日,在SNEC第十五届(2021)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大会暨展览会上,全国人大代表、通威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汉元表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有可能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提前5到10年实现。

“过去十多年来,光伏发电系统成本下降了90%以上,最低中标电价纪录被不断刷新。今年4月,沙特600MW光伏项目以破世界纪录的1.04美分/kWh的价格出售电力,折合人民币大约7分/度。”在刘汉元看来,当前,光伏发电已在全球许多国家和地区成为最经济的发电方式,具备了大规模应用、逐步替代化石能源的条件,成为全球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第一主角。

刘汉元分析称,如进一步考虑生态环境成本,光伏发电的优势将更加明显。从消费端看,交通运输用油约占我国每年原油消费的70%,而燃油汽车百公里电费约为电动汽车百公里电费的4到5倍,因此以输出的等效能量计算,消费

电成本下降了90%,现在中国近80%的区域,抛开非技术成本的话,光伏发电在供给侧的实际成本已低于煤电,平价上网已经不是问题,稳定可持续的平价,以及低价上网才是重点。

“同时,随着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技术的发展,光伏产业与氢能的结合也成为产业融合发展的一种新兴业态。一方面,光伏发电搭配储能解决方案,与特高压、智能电网一起,组成新型电力系统、送、用的完美金三角,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放大长板,补足短板,形成新型能源系统的闭环;另一方面,‘硅-光-氢’的新组合将焕燃登场,利用光伏电解水制备氢气,实现以绿氢为代表的‘气体能源’的无碳化生产、传输、消费和多次利用,也将成为复合型清洁能源供给的主流模式之一。”朱共山认为,“双碳目标”之下,从平价走向低价的光伏电力,将成为新能源中的第一能源,同时也将成为氢能时代的一次能源。

未来,光伏产业将有着怎样的担当?朱共山表示,光伏是实现碳中和的“首选项”和“优选项”,全球认可光伏,国家力挺光伏,时代选择光伏,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和认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光和热。

本报记者 李元丽

“站在‘双碳目标’的历史新坐标,光伏产业正阔步迈向前所未有的新发展阶段。”6月2日,在SNEC第十五届(2021)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大会暨展览会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亿鑫集团董事长朱共山表示,根据全球“碳中和”步伐,同时结合能源变革趋势来看,未来30年间,电力将是最主要的终端能源消费形式,而九成以上的电力,将由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来供应。其中,风电和光伏发电将占据“半壁江山”甚至更多,全球光伏装机容量增长率将保持在10%以上,总装机容量将达到现在的20倍以上。

在朱共山看来,在“双碳目标”下,中国光伏产业的发展将迎来更大的历史机遇。他认为,当中国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之时,中国光伏装机容量有望达到现在的70多倍或者更多。从中期视角来看,“十四五”期间,中国每年新增装机将在80GW左右,累计新增400GW左右。

“当前,碳中和正在催生一场硅基能源取代碳基能源的清洁替代革命。”朱共山表示,在清洁能源驱动能源转型的黄金赛道上,能源供给的清洁化是关键,硅基材料革命带动光伏低价上网,是关键之中的关键。特别是,过去十年,光伏度

电成本下降了90%,现在中国近80%的区域,抛开非技术成本的话,光伏发电在供给侧的实际成本已低于煤电,平价上网已经不是问题,稳定可持续的平价,以及低价上网才是重点。

“同时,随着可再生能源电解水制氢技术的发展,光伏产业与氢能的结合也成为产业融合发展的一种新兴业态。一方面,光伏发电搭配储能解决方案,与特高压、智能电网一起,组成新型电力系统、送、用的完美金三角,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放大长板,补足短板,形成新型能源系统的闭环;另一方面,‘硅-光-氢’的新组合将焕燃登场,利用光伏电解水制备氢气,实现以绿氢为代表的‘气体能源’的无碳化生产、传输、消费和多次利用,也将成为复合型清洁能源供给的主流模式之一。”朱共山认为,“双碳目标”之下,从平价走向低价的光伏电力,将成为新能源中的第一能源,同时也将成为氢能时代的一次能源。

未来,光伏产业将有着怎样的担当?朱共山表示,光伏是实现碳中和的“首选项”和“优选项”,全球认可光伏,国家力挺光伏,时代选择光伏,我们一定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和认可,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光和热。

本报记者 李元丽

强化碳减排系统性规划统筹力度

石玉东

中央将“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作为今年要抓好的重点任务之一。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之工作目标,就必须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继续推进能源革命,为促进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发展,为国民经济增长赋予新动能。

目前我国在碳交易环节已出台3项法规和1个实施方案,加速了部分重点行业碳排放和碳交易进程,明确了非化石能源必将主导未来能源结构的大方向,但各行业、各地区仍缺乏“碳达峰、碳中和”系统化、精细化的强有力统筹措施,因此难以形成“碳达峰、碳中和”攻坚合力。与发达国家碳排放历史进程相比,我国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现有能源消费结构以煤为主,碳排放目标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挑战。近日有关部门出台多项相关政策,但能源行业作为碳排放的先行者,仍存在缺乏顶层设计、交易体系不健全、企业各自为战等问题。

为加速“碳达峰、碳中和”的任务推进,建议:

一是完善我国“碳达峰、碳中和”顶层设计。及早有序推出国家层面的法律和法规,建立与国际接轨统一互认的标准体系;结合国家产业布局等宏观经济发展因素,加强跨区域、跨领域、碳-电市场间协调发展,提出重点行业、重点地

区梯次达峰方案,积极引导各行业快速实现碳减排目标。

二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体系。充分借鉴欧洲发达国家碳排放权监管成熟经验,完善碳排放权监管机制,加强碳排放行为和配额交易的监管,强化政府对碳排放市场的宏观调节作用,建成公开、公正、公平的碳排放权监管体系,以保障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健康发展。

三是加强政策引导推动清洁替代。制定清洁替代激励政策,既要提高供给侧生产清洁能源积极性,又要提高消费侧参与清洁能源意愿;完善清洁替代产业布局,加快清洁能源制氢、制热、就地转化等新兴产业发展,形成新产业链;充分发挥电能在终端完全零排放的特性,将电气化水平提升纳入国家相关行业和城乡发展规划。

四是加快碳排放交易数字化转型。利用区块链、能源大数据、5G通信、人工智能等数字新基建建设契机,完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数字化交易系统建设,进一步提高碳排放监测和评估的精准度,拓展重点行业监控范围,建成全面、精准、高效和可追溯的碳排放监测与交易系统。

(作者系全国人大代表、国网辽宁电力董事长)

碳中和是产业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机遇

本报记者 李元丽

“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是一场任务艰巨的世纪大考。”日前,在京举行的国是论坛之“能源中国——迈向碳达峰:地方经济转型与能源发展新机遇”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表示,碳中和不单纯是一个绿色的故事,更是一个再造中国经济的巨大机遇。

朱民介绍,据估算,从目前到2060年,中国每年将有相当于GDP总量1.5%到2%的资金投入新能源、能源基础设施,以及碳中和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转型之中,预计今年将超过1.5万亿元人民币,以后还会逐渐增加。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李俊峰表示,全国要在2030年前达峰,意味着至少大部分东部地区,如浙江、江苏、广东等省份都要在“十四五”期间达峰。

“实际上从能源消费增长来说,中国大部分省份已经出现了拐点。”李俊峰指出,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接近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甚至和21世纪初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过去是全面增长,现在则是由一两个项目拉动增长。所以,各地对于如何把握发展节奏,能源消费增长与否,应该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

谈及“双碳目标”与能源转型的关系,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指出,碳达峰是能源革命的里程碑,也是碳中和的基础。不能把碳达峰理解成“现在尽量用得高一点”,而是要把碳强度降低65%以上,大约相当于105亿到110亿吨二氧化碳。在他看来,要防止一些地方借碳达峰来“攀高峰”,关键是要防止发展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冲动。碳达峰不是要限制发展,而是指向高质量发展,是产业调整的机遇。中国应借此机会逐步调整高耗能产业占比的现状,同时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

“若想为之后的碳中和争取更多时间,应尽可能将碳达峰的日期提前。”能源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兼中国区总裁邹骞建议,按照空间、区位、能源和资源禀赋及产业布局比较优势,全国统筹优化不同地区在能源、资源能源和产业方面的功能,确定能源供给地区与品种格局,确定能源跨区输送通道的分布。

一是推进国企改革管理创新。建议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专司国有资产监管,不予干预企业依法行使自主经营权、领导班子外的人事权及分配制度。在战略规划、薪酬管理、选人用人、股权改革等方面给予企业更多的自由度,营造良好的企业发展环境。

二是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优化整合财政、科技和产业发展相关计划,扩大现代种业基金规模;对种业企业实施更大力度的定向税费减免、

产品制度”,保护原始创新,提高侵权成本,更好地激发种企特别是龙头企业的研发积极性。实行品种审定改革,建议除国家审定外,以生态区审定替代省级审定制度,进一步完善审定标准,逐步试点建立企业对品种的负责制度,实现品种审定到品种登记制度的过渡。明确转基因和基因编辑政策。提高种企门槛和市场准入,提高国内种企的整体竞争力。

第二,合理分配资源,真正使种企成为创新的主体。

一是促进人才、技术、资源向企业流动。建议通过出台育种公益性研究3年和5年重点目录等方式,进一步明确科研院所的公益性研究范围,推动更多优秀的育种人才转入企业。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引导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通过技术入股、成果参股等方式参与企业商业化育种,解决因惑科研人员的“身份问题”。将资源、技术及品种合理转移到企业推广应用等情况纳入科研单位绩效考核体系,促进科研单位科技成果应用与转化。

二是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优化整合财政、科技和产业发展相关计划,扩大现代种业基金规模;对种业企业实施更大力度的定向税费减免、